

人口知识体系导论*

(苏) 瓦连杰伊

《人体知识体系》一书是以社会科学和一系列自然科学的体系来研究人口问题的。

人口科学知识体系要建立在一般方法论科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决定社会人口过程的各种联系和关系是极其复杂多样的，这些联系和关系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由诸社会过程组成的整体。因此，它们都具有整体的性质和特点，而这又是由整个社会体系所决定的。只有把人口过程置于诸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所组成的不同网络之中，才能对它进行多方面的阐释，即从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心理学和生物学方面加以阐释。如果考虑到人口过程方面的地理学的、人种学的、法学的以及其他的观点，那么可以列举的研究人口过程的学科就更多了。

各种社会人口现象及其所固有的全部规律性都是互相依存的，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完整的、综合的理解。如果不把社会人口过程置于各种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它们都是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的复杂联系之中，那就既不能解释它们，也不可能揭示出它们的规律性。

人口过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过程，只有在综合一系列的社会科学，首先是各门经济学知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它进行分析。

人口的生殖与迁移活动，也和其他各种人口活动一样，只是人口的完整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能把生殖、迁移或其他任何一种人口活动与人口、阶级、社会阶层、社会职业集团、家庭或个人的完整统一的生命活动分离开来。如果使这些过程与人口的其他各种生命活动失去联系，那么这些过程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社会内容及其在完整的社会机体中所应履行的主要职能。

对人口进行综合研究，会导致在人口适度问题上出现一些崭新的观点，而所谓人口适度的实质，就是要在人口再生产与整个社会再生产之间寻求最优的比例。如果把社会体系视为自行再生产的动态体系，那么适度问题就是要在这个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过程和职能活动中寻求一种动态的比例关系。

人口再生产方面发生的各种变化，乃是这一特殊体系对其围周社会环境的一种适应。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相互作用方面所特有的潜在的紧张关系与矛盾，是通过降低出生率来调节的。降低出生率也是使社会体系的这一组成要素同其他各组成要素的总和处于一种新的成比例的相互关系之中。

把人口的发展过程置于社会过程的完整体系之中，就会给研究工作者在方法论和理论方面提供一系列崭新的观点，从而去改变所要描述和解释的由各种联系和关系构成的网络。因此，许多理论概念和基本前提都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这必然会使传统的人口研究领域大为

* 本文译自瓦连杰伊主编的《人口知识体系》(莫斯科统计出版社，1976年版)一书的导言，标题为译者所加。

扩展,更确切地说,会形成新的研究对象。这一新的对象中包括着研究各种人口过程与社会体系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许多新的方面和领域。这样,人口科学的结构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人口科学的一切问题也都将用新的理论来加以阐释。

紧密联系各种社会过程来综合考察人口过程,就会建立起一个借以实现诸过程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传动机制,因而也就能对诸过程所作出的经济和社会的决定加以解释。采取这种研究方法,会使人口过程与社会体系的各组成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加明确。

人口知识体系是被组织起来的知识总和,它比以前的任何其它知识更加具有阐释、预测和实际工作的职能。

在关于人口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的假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口知识体系,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许多门科学的综合而成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的。^①

对人口问题采取综合研究的方法,乃是我们所提出的理论结构的基础。在研究活动中要采用这种方法,是由社会实践本身所决定的。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人口问题研究中心的全体成员,在多年的工作中都力图用切实的内容来“扩展”和充实这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作到了这点。本书的作者们在书中许多地方都指出了今后工作的方向,为解决研究工作者所面临的各种课题提供了一些方法论原则。

我们认为,关于人口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的假说(1961年)^②,促进了对人口中所发生的各种过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之间的密切合作,他们的协同努力,各种科学成果的汇集,这些都对理论和实践起了有益的作用。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过去把一些局部的研究成果加以汇集、分类和“并成”一个总成绩,这并不符合把人口看作是一种具有严格隶属系统的复杂体系。人口科学作为一门统一的具有自己的规律体系的学科,过去多半还只是徒有形式,只不过是某些学科的成果的总和,即只是一些为不同的学科所认识的规律的总和。所以,有必要从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的观点来考察某些学科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成果加以综合。而综合性的成果,又要求有统一的研究过程和明确的逻辑性。

近年来对从经验研究的结果中所积累起来的材料还缺乏具有高度原则性的概括。在研究人口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多种多样的观点,这就需要将所得到的结果加以系统化,把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结为某些共同的具有科学本身的规定性的基本原理。如果对这种系统化工作注意不够,这种观点的多样性就会超越科学发展所容许的限度。这种观点多样性的趋势并不会因观点的完整性趋势而得到平衡。由于“多样性”存在,就会丧失“统一性”。

随着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从同一原则的观点来考察某些学科的成果,并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对这些成果加以综合。

在经济学与人口学,人口学与经济地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种学、法学、社会卫生学、老年学以及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接合处研究人口问题,这在今天已经是很常见的了。许多学科的学者们正在通力合作,研究人口状况及其后果、人口预测和人口政策方面的各种问题。

① 在集体编写的专著《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论》(莫斯科,1974年)和教科书《人口理论基础》(莫斯科,1973年)两书中系统地反映了人口研究方法支持者的观点。

② Д·И·瓦连捷依,《人口问题》,莫斯科,1961年。

协同研究人口的这些或那些过程的学科日益增多，分析具体人口现象所运用的方法不断扩充以及不同学科的观点相互渗透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已在一定的阶段上将研究人口的各门学科综合了起来。

最初只在一些对应学科（人口学与社会卫生学，劳动资源学与人口学，人口地理学与人口学）之间进行的协作现已逐渐扩大起来。对家庭的研究，就是说明这种情形的例子。起初，在分析家庭中所发生的过程时，密切合作的只是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人口学家。可是后来社会卫生学家，再后法学家也都同上述三门学科的学者一起进行了研究。在分析迁移过程和移民以及决定社会变动的其他因素时，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人口问题研究工作发展的经验证明，迫切需要综合有关人口的各种科学知识，制定综合研究社会人口过程的方法。在制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效的人口政策时，这种必要性尤为明显。

单靠一门学科的知识来解释人口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是不够的，而要揭示这些现象在未来历史发展中所派生的后果，那就更加无能为力了。

理论综合的原则，是综合研究人口的基础。在这里综合就是恢复研究对象所固有的、但在对它们进行分析时被割断了的各各种联系，也就是把过去被分割开了的东西重新结合起来。这时，研究对象就恢复了它原有的完整性和具体性。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使认识的较后期阶段，又回归到它的初始阶段。但是，如果说最初的人口是某种杂乱无章的未被分析过的整体，那么现在对它进行综合考察而恢复了它的完整性时则是一个被过去的研究工作分析过的研究对象了。这时，研究工作者就能够在它的发展的多样性中揭示出内在的统一性。因此，这是在认识的更高阶段上恢复了它原有的完整性。

在这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工作中，对人口知识的综合、分析式的研究方法，当然都还要采用，不过分析现在已是作为从属于综合的一个因素了。综合的产生，对于把研究对象即人口进行分析（先于综合进行的）来说，是一种辩证的否定，目的是要恢复由于分析人口中的某些方面或现象（在以前对它们只是孤立地加以研究）而被破坏了的内在的统一性。列宁指出：“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作为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本身的一个要素”^①。

在一定的意义上，综合的概念是与系统化的概念一致的。在系统化的初始阶段，人口是某种杂乱无章的现象。在这一阶段上人口只是具有毫无系统的完整性。而后也只是在表面上的系统化，这时研究工作者还没有揭示出人口发展各组成要素的内在的实际统一性，因为所研究的被分割开的各要素，还象是一个附着在另一个上一样。只有在以后人口学家才试图揭示人口所固有的内在的统一性，因而也才能建立起自然的，即就其实质来说是辩证的系统。

研究人口的各学科的分科和综合，是同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运用于研究科学知识时的相互关系有直接联系的。它们涉及到研究人口的某些学科之间的，或是那些或多或少独立的知识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代科学知识的特征在于各门科学的分科与综合过程的互相补充。看来，应当承认这种见解是合理的。一些学者断言，今天的科学知识是以专门化为特征的，另一些则认为以综合化为特征。这两种意见都未必妥当。在我们的时代，科学发展的特征乃是上述两种相互补充的过程的有机统一。

在今天，各科学领域的逻辑结构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人口知识体系本身的组成

^①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02页。

中正在迅速派生和形成新的科学分支，而人口学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人口科学体系了。

科学并不是关于我们周围现实世界的现象的知识与资料的简单总和，也不是个别人的生活经验及其日常知识的综合。科学这首先是在逻辑上有条理的和有联系的，并且在结构上也是有组织的科学知识体系。

可以认为，科学是历史上形成的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是在逻辑上有组织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被证明了的和不断发展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概念体系，是能够根据社会的利益预见和改造现实的精神生产领域；科学以有目的地获取的事实、假说、理论、规律和研究方法作为自己的结果。^①最一般和经常看到的科学的定义就是如此。科学是系统化地、有目的地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规律和规律性的主要形式。^②

每门科学，或科学认识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生产、形成和发展的特殊规律性。但是，也可以划分出某些科学认识领域形成的共同阶段。这首先是指以下的一些重要方面：研究对象的确定；把各种事实、观察所得的资料、经验、具体的经验研究加以系统化和在逻辑上联系起来；制定和形成各种概念和范畴；形成基本的方法论和理论原则，以及形成局部的和较一般的理论并把它们变成理论体系结构；拟定科学研究的方法（方法论上的程序、方式和具体方法）。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人口知识体系发展的历史证明，上面所列举的那些科学的组成因素并不是按某种固定的严格顺序形成起来的，而是在时间上有不同间隔的。例如，开始可能是制定某些方法，以便有目的地收集资料，用来阐明一些科学事实，而后就可能形成方法论原则并建立起概念工具。

人口知识体系产生的历史在这方面是很可作为例证的。人口统计学和较后的人口学，是在其他科学，即政治算术、普通统计学、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轨道上形成起来的。在人口学中首先形成的是收集经验事实和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的各种统计方式和方法。而开始形成理论概念则要晚得多。

每门科学都要确定它所研究的是客观世界的哪些现象和方面，这已成为一条公理。而且每门科学都要借助于各种术语、概念、范畴来表述客观现实的这些方面。这样，就形成了新的科学语言和新的科学研究对象。二者都属于科学的结构。

人口知识体系，也和任何别的科学一样，具有概念、范畴及规律体系。

作为存在的反映形式和认识支撑点的唯物辩证法的许多基本范畴，是制定人口知识体系概念工具的基础。我们这门人口科学的概念工具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些主要的和基本的概念，象人口、人口质量、人口发展、人口再生产和许多由这些概念派生出来的并作为它们的一部分或组成要素的概念都已明确了。例如，我们研究人口再生产，就要分清什么是自然再生产，什么是迁移和社会移动性。同样，研究人口的发展，确定人口的质量，就要提出诸如普通教育构成、职业构成及其他构成和健康等这样一些概念。这就是说，上述所有的以概念表示的范畴，彼此都有一定的联系，并构成一定的体系，由一个推导出另一个，也就是说有一定的配合和隶属关系。同时应当指出，人口发展过程本身以及科学领域的进步又不断地丰富着概念工具。

① 见 A·Γ·斯及尔金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程》，莫斯科，1966年，第471页。

② 见 П·А·拉奇科夫著《科学与会进步》，莫斯科，1963年第30—31页；《哲学百科全书》，第3卷，莫斯科，1964年，第562页；Д·И·切斯诺科夫著《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1964年，第359页；科普宁著《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莫斯科，1973年，第262页。

人口科学知识的使命就是认识人口发展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奠定的关于人口学说的基础原理中包括了认识这些规律的基本原则。在我们这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各社会形态的人口规律体系、人口的普遍规律正在被认识。人口的普遍规律之一就是人口发展的规律。各社会形态，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规律已被揭示出来。

当然，在人口科学知识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那些范畴和概念，我们并不认为就是始终一成不变的。正是客观实际决定了在我们这门科学的概念工具中所发生的变化。我们所认识的人口客观规律也是这样。

整个人口知识体系是通过各种形式，即通过形成概念、分析与综合所研究的现象、建立假说、用实践不断检验所提出的理论原则而逐渐形成起来的。

现代科学知识发展的特点是：各门学科之间愈益深刻地互相渗透，研究方法和手段相互丰富，越来越多地利用理论概念和原理。这种趋势是由于当需要用科学上实用的办法来控制自然和社会过程时，现代科学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产生的。社会过程按其本性来说乃是一些复杂的和超复杂的系统。应当指出，分科和专门化虽然是科学发展上的一种合乎规律的过程，但是不能不看到，分科和专门化也会导致所认识的对象同有意识、有目的地加以调节的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实际客观过程的人为的割裂。

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要求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但是由于分科和专门化，使得不同学科的学者很难互相“交流”。对此，鲍乌尔金格曾十分生动地写道：“……目前科学的危机由于整个学术界越来越难于进行有益的讨论而加深了。专门化超过了职业化，各门学科间的联系日益困难。知识共和国被分割为各个孤立的学术部门，它们之间只保持着表面上联系，这乃是一场知识上的国内战争行将爆发的危险局面。知识领域之所以要这样划分，是由于在专门化的过程中，情报获得者也被专门化了。因而，物理学家只能与物理学家交流，经济学家只能与经济学家交流，而更糟的是：核子物理学家只能与核子物理学家交流，经济计量学家只能与经济计量学家交流了。有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科学竟还没有使离群索居的隐士们集合在一起，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还在那里自言自语，使用着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的语言。”^①当然，鲍乌尔金格对科学中所造成的状况写得有些过份悲伤，但他却准确地抓住了许多现实问题。

应该看到，知识的分科过程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这表现在自然与社会科学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科学部门和学科。况且，知识的综合过程本身，也只有通过它的对立面即分科才得以实现，并因此出现了一般系统理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其他许多学科。

“新学科的萌芽与形成的过程，即它们分化出来的过程，一直持续至今。但是，这种过程在现代条件下却具有自己的一定特点，这就是在分科，即形成全新的学科，如量子学、核子物理、控制论等（这些新学科是从过去已存在的学科中分出并得到发展的）的同时，综合的过程也越来越发展了。在现已存在的两门或更多门学科的接合处开始出现了独立的学科，这些学科所研究的正是在其形成的接合处所涉及的各项知识领域中所共同存在的问题。”^②

诚然，在这里说不上纯粹的综合。因为，如前所述，综合乃是汇集两门或更多门学科的跨学科的过程。但是，当在两门学科的接合处“建立”第三门学科时，这当然也是综合。

^① 鲍乌尔金格著《一般系统理论——科学的框架》一书中关于一般系统理论的研究，莫斯科，1969年，第108—109页。

^② И·Д·安德烈夫著《科学与社会进步》，莫斯科，1972年，第15页。

显然，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种非常重要的情况，即如果说在十九世纪科学的分科主要是走向专门化的话，那么在今天，分科基本上应从属于综合化，因为消除妨碍跨学科合作的障碍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已经听到了这样的说法：由于一般系统理论、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的存在，已有可能建立起共同的科学语言以及共同的原则、定理和观点。甚至这些学科现在也常常被称之为综合科学。^①

学科和科学工作者的狭窄的专门化会导致一系列十分复杂的问题。狭窄的专门化遭到了来自研究计划较广泛的研究工作者的反对。“我们应该不再象过去那样行事了，似乎自然界是按照大学中的那些学科组织起来的。而根据学科去划分劳动那就更加无效”^②。控制自然和社会过程都要求各学科间相互协作，汇集它们的成果，把它们各自特有的方法综合为更加一般的方法。综合对于那些参与综合的各学科本身来说，将给予非常积极的影响：加速制定研究工作的新方法和新手段，引进和使用新的范畴和概念，形成新的理论和丰富过去所形成的理论。

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多连科对科学中正在形成的状况曾作过十分精确的描述，他说：“现在一切重大的国民经济问题都是综合性的，都要求各门学科的综合。例如，环境问题从一开始就处于生物学、地学、医学、工业工艺学、经济学、数学、力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的交叉路口。这正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现代科学问题的困难所在，但同时也在形成整个科学发展的新的规律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正在综合起来。

“‘边缘’科学问题……引起了不同学科‘接合’的实际必要性，而且这种必要性在多数情况下都超过了现已作出的各种基础工作以及科学和科学工作者在心理上和组织上的准备”^③

在我们看来，对人口科学知识的新的理论结构的研讨，已经导致一个研究人口的各门科学的完整体系。

作为人口科学知识体系开端的普通人口理论，应被看作是人口发展的理论，它所探讨的是综合研究人口理论和方法的问题。

要特别注意这样一些新的学科，如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态学。至于人口地理学，则未必能称其为新的学科，因为它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形成起来并且发展得很快，不过它在人口知识体系的范畴内得到了为其本身在更高质量水平上的发展所需的新的推动因素。

人口知识体系的核心是人口学。我们认为人口学是各门人口科学所组成的体系。除人口学以外，在研究人口发展规律方面起重要作用的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劳动资源经济学、劳动与家庭法、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与人种学的某些部门，以及社会卫生学、老年学、人口遗传学和许多其他科学。

知识发展的原则只有当研究活动本身在具体的历史材料上每次都能再现这一原则时才能成为人口研究的真正原则。这一原则只有在我们的理论结构充满真实内容时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在改进理论结构的同时，也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本书所讨论的内容，正反映了这方面所业已进行了的工作。

(魏津生、袁伦渠合译，陈用权校)

①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可参见 M·Д·阿洪多、B·И·鲍里索夫、B·С·丘赫京著《综合科学与系统研究》一书中关于现代科学知识的综合，莫斯科，1973年；B·С·丘赫京著《控制论与科学知识的综合问题》。

② P·И·阿科弗著《系统、组织与跨学科的研究》一书中关于一般系统理论的研究，第159页。

③ H·П·费多连科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作用》，载于《哲学问题》，1973年，第10期，第37页。